

第二章

八股

八股的形成

清人陶福履甚为简明地叙述了经义文体演变为八股的历史：“四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元仁宗皇庆初，复科举，仍用经义，体式小变，其文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题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后又小变，然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一定不易。明初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宏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¹

有些学者从构成八股的各种成分如破题、对偶等方面来追论八股的起源，² 也有的学者从原始结构和义理来源溯其远祖，³ 从而把八股的萌芽追溯到明初、元、宋乃至唐、汉、战国、春秋，不一而足。本文不拟细探八股文的源流，也不欲明确系年八股产生的时间，因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⁴ 即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标准、典型的八股文？如果说入语气、用排偶即为八股，则宋人文天祥乃至王安石的经义文已经是八股了；如果说对偶句段为八方为八股，则清代制义亦非全是八股，晚清许多试卷其实只是六比也属正格，更勿论还有许多或二、或三、或十、十二比等种种变化了。所以，更重要的可能

还是要看全体、看整篇，看是否已形成垂之长久的定式。⁵ 故本文仅拟紧密联系科举考试来看一种较完整成形、长期固定的经义八股，这种八股文作为一种综合的文体样式，尤其是作为一种相当持久固定、为千百万人小心遵循的文章程式，⁶ 离开考试就确实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本文想强调八股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自然而然性。

自明代延至晚清的经义应试文（八股）的基本格式是：

——破题（两句散行）

——承题（三、四散句）

冒子 ——起讲（七、八句或十余句，散行浑写题意）

……入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起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出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比 ——中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后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束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收结（三、四散句）⁷

元倪士毅说，宋之盛如张才叔自靖义，“至宋季则其篇甚长，首有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其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今之经义不拘格律，然亦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⁸ 由此可大略得出发展到宋季时的经义文结构如下：

破题

接题

冒子 小讲

缴结

原题

上段

入官题 大讲 中段

下段

从讲（余意）

原经

结尾

元代基本上如宋，但比其简单，一定不易的只有以下四个部分的结构：

冒题

原题

讲题

结题

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到南宋末（1279）约二百年间，经义文已发展到一个格式相当繁复固定的程度，甚至可说与明中叶以后的八股格式相差无多。此又不仅经义，宋代的“论”这一应试文也在这期间形成了与经义相差无几的格式。纪昀说：宋代考试“论”体使用得比其他文体还要多些，其始也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审，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逾越。“论”体中之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基本上跟经义式一样，甚至更为发达，“实后来八比之滥觞。”⁹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是并无经题之限，而是要求“自出机杼”的论也不例外。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当时论体限五百字以上，却无下限，经义亦同。这易助长繁复之风，实际上，在南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至少比元代及明初经义文更接近）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的一圈。

宋末战乱，元代早期科举考试又停了几十年，客观上可能反有助于斩断繁复琐碎的严密程式之风，¹⁰ 所以，元代，明初的经义文反趋朴实，不再拘于比偶，格式也只需循大要而不必严守细节。明初四书义又限三百字以内，五经义五百字以内，文较短小简明。但时间一长，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八股在明代的产生正如顾亭林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1457～1464）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可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摭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

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¹¹ 清代八股比较起明代中叶来，变化主要是大结缩短，起讲延长和字数增加。¹²

在此，有一种说法尤须加以辨析，即认为八股文体是由朱元璋所定，由朝廷立法所定，其根据大概是来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¹³ 明洪武三年定考试文字程式，并没有厘定八股程式，明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¹⁴ 固定的两两对偶及全篇之式看来还是如顾炎武所说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的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定型，至此以后四百多年，在格式上方无大变。

我们还可以就目前所能读到的应试文，来看成形的八股是否明洪武时所定。明初黄子澄（1350-1420），分宜人。洪武乙丑（1385）会元，下面是他当时的一篇试卷：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¹⁵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明，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当斯时也，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若礼若乐，国之大纲，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若征若伐，国之大纲，则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马。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皇灵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懍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此篇在结构上破承起讲收结之意相当明显，短对偶句亦甚多，但格式并不固定，并未在以后成为定制，其后的经义并不严守其式。明初经义还基本上和元人一样只是守其大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可再以薛瑄的一篇四书文为证。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年间成进士，下面大概是他晚年所作的一篇程文：16

仪封人请见 一节 17

封人未见圣而思之切，既见圣而叹之深。夫天不丧道，二三子可无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见而有木铎之叹也。惟时孔子辙环至

卫，适于仪有隐君子者溷迹于封疆之间，其姓与名不可得传矣。封人其官也，彼其望圣人而若企前从者而陈词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此其意笃而至，语慕而周。贤哉封人，其若弗克见之，思有足多者，逮乎从者见之，而封人遂有慨乎其中也，乃出而叹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盖否而必泰者天也，往而必返者势也。况乎有其具，不患无其施，而拙于藏，当必大于用，则今天下聋聩舍夫子其谁起？故曰天下之无道也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噫，夫子生不遇于时，如仪封人者，亦可为倾盖之交也。此文破承起讲收结之意亦相当明显，但中间散行朴实无华，反不像黄子澄那样“拘于作对”。以上的证据也许已可表明，延至晚清的基本经义格式（八股）并不是在明初由朝廷所定，而是至明中叶方由下渐渐定型。然而，这一切也许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即便假设八股程式确实是明初由朱元璋、刘基所定，并有意以之作为一种加强专制、束缚士子的工具，¹⁸ 或者所定是另一种文字程式，那么，这种程式也不大可能是由朱元璋等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更可能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程式略加框定而已。这种程式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无数人参与的过程。我所要强调的也就是这一过程的漫长及其自然而然性。八股的产生无法系于某一个人，无法系于某一个明确的年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八股文体的创造者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名流显要，而是许多籍籍无名者。其动机自然也并非是要加强君权之类，而主要是为方便考试。所以，认为八股程式是明初由朝廷明文规定是不确的。这种程式实际上很难自上而下一次框定，而只能自下而上逐渐形成：首先由考官和士子在作

文与衡文的反复互动中，逐渐成形并得到某种默认，成为某种不成文法，然后才成为某种明确的定制。另外，八股的形成与汉字有着特别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汉字在世界上算是很特别的一种，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这样，由对字而到门联，由门联而到挽联，而到很长的挽联，便和八股文很接近了。中国打“灯谜”的事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各地方各界很普遍。低级的灯谜，和高级的破题，原是同一种道理。因此，他觉得八股文之所以造成，大部分是由于民间的风气使然，并不是专因为某个皇帝特别提倡的缘故。他说：“总括起来，八股文和试帖诗都一样，其来源：一为朝廷的考试，一为汉字的特别形状，而另一则为中国的戏剧。其时代可以说自宋朝即已开始，无非到清朝才集其大成罢了。”¹⁹ 总之，经义取固定的八股形式并非一日所成，一法所定，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程式比之为某种习惯法。

基本范式

清人初学八股，重视区分层次，往往先读八股形成之初即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之文数十篇，以为入门之路。“此四朝文者，制艺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²⁰ 此时的八股文简明扼要，易于把握，下面我们即以这四朝的五篇八股程墨名文，²¹ 予以标点，分段，区别名目，交代作者背景，并略加点评。²²

这些文章均选自方苞遵乾隆之旨为厘正科场文体所选的《钦定四书文》，是“清真雅正”标准的具体展现，故还可从其看清廷所悬功令标准。

钱福（约 1505 年前后在世）字与谦，号鹤滩，华亭（今上海）人，最早的制义名家，与王守溪并称“钱王”。少负异才，科名鼎盛。弘治庚戌（1490 年）会元、状元，授翰林修撰。诗文藻丽敏妙，登第后名声煊赫，远近以版乞题者无虚日。， 23 下为其文： 24

好仁者无以尚之 二段 25

（破题）圣人论人之成德，有以好仁之笃言者，有以恶不仁之至言者。

（承题）盖好仁而物无以加，则好之也笃，恶不仁而物无所累，则恶之也至。

（起讲）人之成德有如此，此所以难得也与，夫子意若曰：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凡出于天理之公者，不必皆同而均谓之仁，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同而谓之不仁。

（两扇上）自夫人有秉彝好德之意，孰不知仁之足好而或不能无不好者，以拒之于内，则所好为不笃，犹不好也。吾所谓未见好仁者，岂谓若人哉！盖必气禀纯粹而真知是仁之可好，其于仁也，天下之物

而无以加其好焉，吾知其甚于水火，甘于刍豢，内重而见外之轻，得深而见诱之少。生所好也，而仁在于死则杀身以成仁；财所好也，而仁在于施则散财以行之，则其好之可谓笃，而成德之事在是矣。

（两扇下）自夫人有羞恶是非之心，孰不知不仁之可恶而或不能无不恶者，以挽之于中，则其恶为未至，犹不恶也。吾所谓未见恶不仁者，岂谓若人哉！盖必资禀严毅而真知不仁之可恶，其为仁者，不使有一毫不仁之事有以加乎其身焉，吾知其避之如蛇蝎，远之如鸩毒，出乎彼而入乎此，不为不仁而所为皆仁，视听言动之运于吾身也，而或非礼之害于仁者不忽焉，以少累声色货利之接于吾身也，而或不仁之妨乎？仁者不暂焉，以少处微，极于纤悉之过，尚肯使之加乎其身哉？恶不仁者，而不使加，则其恶恶可谓至，而成德之事在此矣。

（收结）然则夫子未见之叹，夫岂偶然之故哉！

这是一篇典型的两扇题文，一扇讲“好仁”，一扇讲“恶不仁”，应当说大比最难作也最见功力。原评语曰：“太史公之所以独高千古者，以其气大也。此文当观其一往奔放、气力胜人处，如徒摘水火、刍豢、蛇蝎、鸩毒语，为先辈訾议，则以小失大矣。”

下面我们来比较两篇同样题目的文章：一篇是丘浚的程文，一篇是王鏊的墨卷，丘浚（1418-1485）字伸深，广东琼山人。景泰甲戌（1454年）进士，授编修，成化间为国子监祭酒。下为其程文：26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27

（破题）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

（承题）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有而自得其安哉？

（起讲）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谓夫周公以六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之遗患未息。

（起股）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出题）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

（中股）是以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

（后股）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猛兽既驱，则兽之害人

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家室田畴之内而无惊忧之扰。

（大结）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嗟夫，天生圣人，为民主也。中国帝王所自立，岂夷狄所得而干之耶？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所得而扰之耶？是以有虞之世，蛮夷猾夏，即任于皋陶，惠予鸟兽，复任于伯益，有由然也。周公承圣道之传，当世道之责，此其所以不容己于斯欤。

我们再来看王鏊的抡元墨卷。王鏊（1450-1524）字济之，世称守溪，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宪宗成化甲午（1474年）解元，乙未（1475）会元，廷对为第三，是为制义大家。28 下为其文：29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破题）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

（承题）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周公拨乱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为者欤。

（起讲）孟子答公都子问而言及此，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之才。商纣之世，民之困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于上，周公佐之于下。

（起股）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发而左衽矣，周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

姓者也；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于是起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

（中股）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

（后股）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功；上恬下熙，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

（大结）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虽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盖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天下之害者也，孔子卒，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韩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对王鏊的这篇文章，原评曰：“字字典切，可配经传，佳处尤在用意深厚、是圣人使人各得其所。”方苞评曰：“浑厚清和，法足辞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对这两篇文章，方苞合评曰：“骨力雄峻，函盖一时，此程与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又说：“元作重讲百姓宁，此程重讲兼驱，是其用意异处；俱先于反面透醒，是其作法同处。”³⁰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武进人。嘉靖己丑（1529年）会元，亦为制义名家。下为其墨卷：³¹

请问其目 一节 32

（破题）大贤问仁之目，得圣教而以为己任焉。

（承题）甚矣颜子之力于为仁也，领克复之目而任之不辞，非有得于心法之传者而能之乎？

（起讲）昔颜渊问仁于孔子，而承克己复礼之训也，想其求仁之志素定于心斋之后，而理欲之分默会于善诱之余，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目也。夫子喜其见理之真，乃悉数其目以告之曰：物交之迹虽由外以感，其中善恶之机则由中以达于外，而仁岂必求诸远哉，近取诸身而已矣。

（起股）彼目司视，耳司听，而心实主之也，若非礼而欲视，则绝之以勿视，非视而欲听，则绝之以勿听，如此则心不诱于声色之私，而作哲作谋之体立矣；口有言，身有动，而主之者心也。苟非礼而欲言，则绝之而勿以形诸口，非礼而欲动，则绝之而勿以形诸身，如此，则心不涉于尤悔之累，而又作肃之用行矣。

（过接）克己复礼之目端在于此。颜子遂从而任之曰：

（中股）仁道必至明者而后察其几，回之质虽非至明者也，尚当既竭吾才，于所谓视听言动者，择之精而不昧于所从；仁道必至健者

而后致其决，回之资虽非至健者也，尚当拳拳服膺，而于所谓视听言动者，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

（后股）以为仁由己自励，不敢诿之于人也；以天下归仁自期，亦不敢半途而废也。

（过接）斯则回之所当自尽者乎。

（收结）吁，夫子之善教，颜子之善学，两当之矣。

此文先后入两人口气，形成对话，亦是一奇。原评曰：“荆川三墨，惟此可谓规圆矩方，绳直准平矣。”³³

最后，我们看归有光的一篇墨卷。归有光（1506-1571）字昭甫，又字开甫，号震川，昆山人。少颖异，九岁能属文，弱冠通五经三史，中举后屡试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道，学者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但至嘉靖乙丑（1565年）始中进士。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与唐顺之并称“归唐”，其文被誉为“涵盖一世”。³⁴ 下为其文：³⁵

诗曰天生烝民 一节³⁶

（破题）大贤引诗与圣人之言，所以明人性之无不善也。

（承题）夫性出于天而同具于人者也，观诗与孔子之说，而性善之言不益信矣乎！

（起讲）孟子告公都子之意至此，谓夫性善不明于天下，盖自诸子之论兴而不能折衷于圣人也。昔孔子尝读烝民之诗而赞之矣，诗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诗人之所以为知道而通于性命之理者也；盖造化流行，发育万物者，莫非气以为之运，而真精妙合所以根柢乎品江者，莫非理以为之主，惟其运乎气也，而物之能焉，惟其主乎理也，而物之则具焉。

（起股）肖形宇宙，谓之非物之象则不可，而有不囿于象者，即此而在，其本然之妙，若有规矩而不可越，是声色象貌，皆道之所丽焉者也；禀气阴阳，谓之非物之形则不可，而有不滞于形者，随寓而存，其当然之法，若将范围而不过，是动作威仪，皆道之所寄焉者也。

（中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则，天下之生久矣，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盖有不与世而升降者矣；有万物必有万物之则，生人之类繁矣，同此生则同此理，盖有不因时而隆污者矣。

（过接）是以懿德之好协于同然，而好爵之摩通于斯世。

（后股）仁统天下之善，义公天下之利，天下均以为仁义而孜孜焉，乐之不厌，以为其出于性耳，不然，一人好之，而千万人能保其皆好之乎？礼嘉天下之会，知别天下之宜，天下皆以为礼知而忻忻焉，爱之无穷，以为其性之所同耳，不然，则好于一人，而能保其达于天下乎？

（束股）可见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于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出于天。

（收结）性善之说，折衷于孔子，而诸子纷纷之论，不待辨而明矣。

本文原评曰：“举孔子以折服诸子，不是单引诗词，故归重孔子，赞与诗同词，故但直出诗词而重发下文，此先辈相题最精处，文之浑雄雅健，在稿中亦为上乘。”基本范式已陈，下面我们再从八股的几个主要成分及特点来作进一步的考察。

破题

破题即每篇文章的起首两句，³⁷ 用来说明全文的主题要义，之所以称之为“破”，用张行简的话说是“题整而分析言之，如整物而使之破，故谓之破题”。³⁸ 或可说把一题破分成两句，从题义中析取一个角度，一个要点。清代破题要求结尾用虚词，如“也”、“矣”、“焉”、“已”、“而已”等，但不可用疑问，反诘虚词。破题且不可直说人名、物名，而必须用其他词来代替，此已形成定式。³⁹

破题对考试获隽十分重要。据说，金声初应童试，题为：“岂不曰以位”，他终日构思而不能成篇，时交卷者将尽，学政使人察其卷，只成一破题，将要扶出时，学政取破题来看，见破题两句是：“君所挟以傲士者，固士所筹及者也。”此不仅吻合题意，且与当时情况亦有微妙相合处。学政因而击节赞赏，给烛令写完全篇，于是金声当年

入泮。而破题未妥者则往往被黜或遭人嘲笑，如陈宪章应试南宫，破“老者安之”三句为：“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十个字出现三个“等”字，首先不免累赘，于是有人批其旁云：“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⁴⁰ 还有，科场阅卷，考官少而试卷多，考官常易疲累，故文章开头是否能写得精辟警醒，开门见山，乃至开门就见山之奇峻，从而引起考官注意，自然对考生来说相当重要。

但破题之重要更在于其本身，在于其与整篇文章的关系。刘熙载说：“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⁴¹ 考官所出经义之题为我给定了一个范围，然而，在这一范围内如何写，主要写些什么，从那个角度入手，则就要看我如何破题了，所以，破题是一个最优先，最基本的训练和要求。⁴² 一次考试，千百士子，同样一个题目，文章却千姿百态，高下悬殊，其差别首先在破题。此正如刘熙载所言：“破题是个小全篇”，“全篇之神奇变化，此为见端。”⁴³ 下面我们试来观察同治戊辰科（1868）会试首场首艺的破题：⁴⁴

文题：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⁴⁵

破题：

郑训承（乌程5）：更徵君子之所畏，由天命而兼及之也。

葛荣干（蓬莱7）：人与言亦通乎天，君子所必畏也。

孙汝明（大兴 10）：人与言亦深其畏，皆本天命而出者也。许景澄

（嘉兴 16）：继天命而言畏，畏愈显矣。

陈瑜（宜春 21）：合大人圣言以为畏，一本于敬天之意而已。

孙慧基（桐城 22）：继天命而观所谓，一畏天之心也。

林祖述（无锡 28）：人与言皆本乎天命，敬天者所必畏也。

沈善登（桐乡 30）：有为天命所寄者，君子并致其畏焉。

吴宝恕（吴县 37）：有上承乎天命者，本畏天以为畏焉。

李应鸿（南海 39）：更徵君子治心之学，亦奉天以精所择而已。

刘履安（商丘 40）：由天命而递举所畏，识之真故畏之切也。

熊汝梅（黄安 44）：大人与圣言并畏，敬天之心益见矣。

金兆基（诸暨 46）：大人与圣言交畏，达天所以敬天焉。

徐鸣皋（宜兴 53）：尽人以合天，更徵之大人圣言矣。

陈兆翰（鄞县 56）：天即人而存，畏人即以畏天也。

冯方缉（吴县 58）：畏有徵诸实者，始终一敬天之心也。

陈达（江宁 60）：有为天命所寄者，亦畏天者所当畏也。

余鉴（婺源 61）：人有与天命并畏者，将尽人以合天也。

黄自元（安化 66）：进天命而详所畏，犹是达天之学也。

徐文（江阴 67）：由天命而进推所畏，益见敬天之深矣。

丁云翰（祥符 70）：继天命以明所畏，尽人合天之学也。

陈以咸（钱唐 71）：有为天命所寄者，交傲焉而心愈切矣。

严蔚文（余姚 86）：畏有因天命而进者，大人圣言可并徵焉。

顾树屏（广丰 87）：有因人见天者，畏人犹之畏天也。

余烈（金华 88）：更观君子之所畏，即天命所属者懍之而已。

欧阳銜（安福 91）：事人即以事天，惟君子明其故焉。

罗德綉（南丰 100）：畏有尽人合天者，可继天命而备举焉。

馨德（满洲 102）：进天命以言畏，君子仍畏天命之心也。

皇甫治（吴县 106）：奉至人以奉天，仍一畏天之心也。

于万川（丰润 107）：继言君子之所畏，由天命而推之者也。

夏玉瑚（罗山 119）：畏又在于人与立者，一敬天之心也。

张绍棠（吴县 129）：畏及于大人圣言，皆天命之所系也。

杨际春（高邮 131）：人与言交致其畏，畏人所以承天也。

徐家鼎（太湖 164）：畏有在人与言者，皆天命所分及也。

胡乔年（天门 166）窥天命之所寄，畏并深矣。

赵汝臣（黄县 173）：更即大人圣言观君子，仍以畏天者畏之焉。

刘廷枚（吴县 174）：人有上承天命者，本畏天以为畏焉。

徐作梅（上虞 203）：以天视人，而人皆可畏矣。

嵩申（镶黄 208）：以畏人者畏天，主敬之学全矣。

高蔚光（昆明 210）：畏又存乎人与言，君子以诚达天也。

广照（正白 219）：人与言交畏，犹是畏天命之心焉。

徐祥麟（祥符 231）：人与言皆天命所系，畏之而其功全矣。

刘海鳌（云阳 250）：有为天命所寄者，畏之又不容己矣。

鲁琪光（南丰 251）：继天命而有畏，识义理之至者也。

李郁华（新化 266）：畏更在于人与言，君子之明于天命也。

以上破题，都恪遵朱注：“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故而讲“畏天命”并非侵上；诸破题无一语涉及“小人”，故而亦不犯下。文题所限，各个破题的意思自然不可能迥异，而只有微殊，然而又正要在这“微殊”上大做文章，从这“微殊”生发开去，演出“迥异”的文章，而以上如此多破题，竟无两个字句相同者，亦是一奇。八股是带着镣铐跳舞，然而又毕竟仍然容有许多变化。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式、规则，就难以有一个共同、客观的标准，如果没有一定变化的空间，也难以衡量出文章的优劣高下。

破题的作法，梁素冶概括得最为精确。他说：凡作破题，最要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期于浑括清醒，精确不移。其法不可侵上，不可漏题，不可骂题。语涉上文谓之侵上；语犯下文谓之犯下；将本题意思未经破全，或有遗漏，是谓漏题；将本题字眼全然写出，不能浑融，是谓骂题。其两句之中，有明破暗破，46 顺破逆破，47 正破反破。又有上句领章旨，下句讲本题者；有上句讲本题，下句承章旨者；有上句讲本题，下句或推开，或吸下，或直断，或虚足者。有两句分破题面者，有两句如门扇对峙者，有上句即用‘也’字、‘焉’字者，皆常格也。至于用三句者则变格也。长题之破贵简括，搭题之破贵融贯，大题之破贵冠冕，小题之破贵灵巧。48

我们可以再略看一科——同治十年辛未科会试的破题，其文题是：“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敬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49 在《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 59 篇文章的破题中

（题多不录），仅有两题相同，即第二名邵世恩与第七十六名吴浚所破，但文章自然仍做得不同。破题诸义大都遵守朱熹对“有子”此章的所释：“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尤其是扣紧“谨始”之义为多，其次则是“无悔”。说明考生能发挥的空间确实有限，但也不尽然，陕西石泉彭懋谦破为“君子寡过之道，在去其太过者而已”，就觉较新鲜，且亦中式。50

代

“代”即代入语气，代人说话，代人说理，“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⁵¹ 由于制义之题并非“根于己”，而是“根于经”，就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代人说话。又由于经书主要是圣贤之言，“代”就主要是“代圣贤立言”，代圣人说话。童生试所出小题因为较零碎，又有截搭等种种名目，故偶尔也会有题出到如阳虎、王孙贾、微生亩之言行乃至犬吠之类，此时作文也可代入此类主体之口气，但一般来说，远为郑重的乡会试所出大题都是“代圣贤立言”，要求考生阐发的都是圣贤义理。

“代”也叫“揣摩”，⁵² 即设身处地，假设自己就是原题之作者，设想自己处于此种地位，感同身受，会说些什么。也正是因为有“代”，才有话可说，有活泼文机，否则，圣贤之言已全著于题，题无剩义，还有何话可说。也是因为“有代”，有“代”者理解、领悟水平的高下深浅，也才会有文章的高下深浅，而由文之拘谨或活泼，

又可见“代”者之胸次或机敏，故汪武曹曰：“代法者，时艺之金针，信矣哉！”⁵³

“代”由来已久，古今中外作文皆有其法，钱钟书于此有专论，他指出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 *prosopoeia*，学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记卒业考试，以拉丁文拟罗马皇帝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说此即“洋八股”也。⁵⁴ 此“拟”也即“代”，中国古代文化中各种“拟”作更是多多。“代”法又可入史，如《左传》记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其母偕逃前之问答等，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左传》所记，盖非记言，乃代言也。是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论草创（也是八股“代言”之椎论草创），未遽过也。⁵⁵ “代”法可入史，自然更可入文。八股古代即称之为“代言”，盖揣摩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宋人四书文自出辩论，明清两代好的八股文则揣摩孔孟情事，真是栩栩如生，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于杂剧传奇最相通，最接近，故焦循等以八股与元曲比附，认八股源于元曲，⁵⁶ 因而，一些作八股觉拘谨、呆板、无话可说者，常被指点从曲、剧、传奇中讨生机、得启发。⁵⁷

我们又可将“代”比之于现代西方学者常常讨论的、是为当代一大课题的“identity”（认同、自居），此认同自然是向历史认同，

向圣贤认同，一人自幼习举业，持久自居，始终认同，焉知“代者”与“被代”不会渐渐接近？又焉知假借既久不会成为己物？这大概也正是方苞所言“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的意思。⁵⁸ 由此亦可见出“代”在传统社会中“一道德”的功效。⁵⁹

比

八股文也叫八比文，破承起讲的“冒子”后，即为比的部分，是为全文的主干及华彩部分（如果文章作得有华彩的话）。商衍鎏说：“比者对也，起、中、后、束各两比内，凡句之长短，字之繁简，与夫声调缓急之间，皆须相对成文，是为八股之正格。”⁶⁰ 文章每两股成一对，单看一股，就像散文，但若再看与之对应的另一股，则字句长短、虚字实字，人名地名乃至声调平仄都与之相当。意思也常常是单看一股则偏，再看一股则全。一般全文有八比（八股），即起二比（也叫起股或提比）、中二比（中股），后二大比（后股），末二小比（也叫束股或束比），但二小比亦有提前用于起比之后，或中比之后者，有时也径直略去，这样全文就是六股了，蔡元培说：至晚清，六股已是很普通，⁶¹ 这一点我们也在阅读晚清朱卷中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突出大比，集中精力在大比中发挥。但是，比太少又可能失去变化起伏，⁶² 故八股文一般以六比、八比为正格。朱彭寿说：“余昔从事举业时，窗下所作课艺，每篇无不为六比者。戊子乡试，题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余遵文公集注，以诗书、礼乐、易象春秋，

劈分三比；乙未会试，题为《主忠信》，复以主忠、主信、主忠信，劈分三比，皆获中式，盖同中见异，阅者较易刮目耳，然实非正格。凡抡元之作，例不取偏锋也。”⁶³

比、对偶在诗文中是源远流长、司空见惯。梁天池认为，比是本事物“阴阳奇偶之理”，而排偶之法，“汉晋以来，无人夫不讲此。即四书五经中对偶之句层见叠出，时代愈近则其辞愈妍，其势使然。”⁶⁴ 有比偶易见文采，自然也增加了难度，刘熙载说：“《易系传》言‘物相杂故曰文’《国语》曰‘物一无文’，可见文之为物，必有对也。”⁶⁵

比股的作法，一般是提二股用来原题，以提起题意，宜虚而不宜太实，点到即止，一般四、五句即可；中二股要正发题意，要切实，但还要留有不尽之意；后二股是推廓题意，要努力另发心思，别开生面，束股一名缴股，是总一篇之局而收束之股，要短，但笔法要紧严，是比的部分归宗结穴之处。此两小股也可用于提股之后，这时叫“虚股”，用来点出题面，或者也可径直略去。这样的情况下，后股也就要有收束之意了。刘熙载说文之出对比有七法：“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⁶⁶ 又有分股立柱之法，即于股首或创一意，或拈一字，或提一事，用为一股之绳，领股中意义。有从题意立柱者，如理学题用‘致知力行’分股，仕进题用‘致君泽民’分股。有从题面立柱者，如‘忠信’题以‘忠信’分股，‘致中和’题以‘中和’分股。有就注语立柱者，如

‘夫何为哉’题，以‘绍尧得人’分股，‘至道不凝焉’题，以‘聚’字‘成’字分股等等。67

比的例子自然比比皆是，下仅略举二例：如前 1868 年会试题“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第 5 名郑训承的破题是“更徵君子之所畏，由天命而兼及之也。”，其前四比是：68

（起二比）惟大人中无不诚，立其命于真实无妄，日用伦常之地，人人所当共尽者，大人独先自尽之，本身作则，纯粹精也，故巍巍者大人之望，自足表率于群伦；惟圣人德无不备，凝其命于保合太和，民彝物则之原，人人所当共明者，圣人独先自明之，吐辞为精，明辨皙也，故洋洋者圣人之谟，自足范围乎百氏。（中二比）然则大人天命之所归也，君子即以畏天命畏之。昭为大德，畏焉而敬守典型，布为大猷，畏焉而恪循轨度，明物察伦，大人独至之，诣正君子欲至之诣，人之畏大人在势分，君子之畏大人在性功也，则契合真也；然则圣人之言，天命之所寄也，君子亦以畏天命者畏之。切近之言，畏焉而不愈于易，精微之言，畏焉而不阻于难，至德要道，圣人垂训之，书皆君子律己之书，人之畏圣言在法语，君子之畏圣言在师资也，则策励深也。

起二比分别提起“大人”、“圣人”，中二比方点出“畏”字，说明为什么要畏，君子之畏与一般人之畏有何不同。本房于此文加批曰：“气体文华，词旨精到，方家举止，庶几接迹归胡，非揣摩风尚

者能与之争工拙。”再看第 16 名许景澄的破题是：“继天命而言畏，畏愈显矣。”其前四比是：

（起二比）非必震人以势分也，第觉至德无为，克膺天位，神功广运，可代天工，瞻视有由尊，实鉴观有由属也，则俨恪难宽也；非必耸人以听闻也，第觉传为心法，天理常存，若为民彝，天经悉备，德音有由播，实帝谓有由通也，则率循罔越也。（中二比）惟君子以纲常名教，斯世贵有完人，而无党无偏，皇极早端及趋向，故天威钦咫尺，瞻覲者倍懍森严；惟君子以才智聪明，克念皆堪作圣而是彝是训，先民早示以准绳，故天道阐精微，诵习者弥深警惧。

以上起比与中比比较平均，起比先从反面引出为何要畏，但并不多着笔，并不实写，中比方点出“君子”。

连接全篇

八股虽然有骈有散，有虚有实，有朴有华，却讲究浑然一体。破之后有承，承之后小讲，小讲之后又再入文题，然后是起二股，一般起二股之后又再点出题目，再中二股，后二股大段发挥，这期间又可能有过接，之后或嘎然而止，或再用二小比束股，然后收结，如系引申出文题下文的意思则叫“落下”。总之，破题、承题、起讲、入题之间，各比之间、以及冒子与比、与收结之间都要有一种紧密的有机联系，不仅在语气上能顺得过来，使人有一气呵成之感，而且要收一种整篇有理有法、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之效。有人将八股文譬之於人：

“破题犹冠也，承题犹发也，起讲犹首也，入手犹项也，起股犹两臂也，中股犹腹背也，后股犹两腿也，束股两足也，中间之出落呼应，犹通身之筋脉也。”⁶⁹ 所以，古人讲究全篇起承转收连接之法。

承题如遇长题，不能逐句承出，宜择关切重大者笼括之。承题最忌平头并脚。平头者，领头数字与破题头数字相同，如破题领头用‘圣人’，承题领头亦用‘圣人’。并脚者，煞尾数字与破题煞尾数字相同，如破题煞尾用‘而已’字，承题煞尾亦用‘而已’字。破题于圣贤帝王诸人，须用破讲，承题则直言之，如尧、舜则真称尧、舜，孔子则直称孔子，其余诸人皆因题直称，无复避忌。起讲扼一篇之纲领，而发其大旨，故最宜浑融，不宜刻露。起讲妙处，全在包笼大势，虚而不泛，既能发全题之神，复能养全篇之局。一则安顿上文有法，不至令书义颠倒；二则能留余地，不至将题意说完，后幅可免重叠之病。

后来有些作者还有意在一股之内“起承转收”，但此不免过于琐碎，而因小失大，吴吕白说：前辈之文，一篇中多有十数股者，其股体短，或四五句，或五六句，本股无起承转收，以通篇为起承转收，所以其体圆，其神隽，有古文意。若今之长比排偶自为起承转收，则四比成四截，神气不贯，全无古文意。⁷⁰

下面我们可以举光绪 6 年庚辰科（1880 年）沈曾植、李慈铭的会试卷来说明八股文之连接全篇：71

沈曾植，嘉兴人、同治癸酉科顺天乡试第 22 名，会试 24 名，殿试三甲 97 名，用刑部主事，当年会试首题是：“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出自《论语·为政篇》，沈氏的破题是：“有深会圣言者，如愚所以不愚也。”，承题是：“盖其会圣言也不深，则其发圣言也必浅，即其私而退省之，不愚者不诚赖如愚哉？”起讲兹略，然后是代入孔子语气之起二比：“高坚前后之程，吾与回言无不尽，顾何以言所以，言所已及，回与相近，言所未伸，回并不与，……言动视听之则，吾与回言且无余，顾何以言之偶传，质疑有待言之时，示偏觉索解无闻……”然后是出题：“如是焉而言已终日也，噫，愚矣，愚于进安，必其不愚于退也，而吾且省之。”然后是二小比：“燕私之地，不假提撕，体诸心有验诸身，而亦前亦趋欲从者其志；启发之机，不关愤悱，积乎中以形乎外，而无施无伐不惰者其神。”随后“盖违而发者恒情也”是一句过接，然后是中二比：“夫孰知不违而亦发也，……；夫孰知不违亦足以发也，……。”后二大比：“而后知回之明悟独深也，……；而后知回之涵养独粹也，……。”最后以简明扼要的两句收结：“回愚乎，回不愚乎？”

第二题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题出自《中庸》，沈的破题是：“效有极于四方天下者，柔怀所以治外也。”紧随承题：“夫四方归之，天下畏之，岂非有国者所欲得诸天下者哉，柔焉怀焉，其效斯在。”然后起讲：“且王者体天出治，昭其德者，云瞻日就；服其令者，雷厉风行，……”（以下代入口气）

“臣请进子来而言柔怀，今夫有分土者无分民，故王泽之隆，不遗远者，定一尊者大一统，故风同之盛首戢强侯，请以四方天下观。”然后起二比：“谓盛朝不尚招携，何以戎狄蛮闽职方怀方隶其数；谓王者不矜控制，何以山川种族四荒四极纪其名……谓强藩之悍戾难驯，何以弓矢戎兵神武昭，而天下之材能尽戢，谓封建之事权易散，何以躬桓蒲穀朝仪肃，而天下之意气皆平，……”以下略。

第三题是“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即所谓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沈曾植破题为：“论人者必论世，不徒颂读也已。”承题略，起讲首言：“尝思阅世生人，阅人成世，此古今之人所由判也……。”然后起二比：“琴瑟有不言之隐，上观千古，下观千古，音尘隔者神理自通，善不限于方隅，善何容限于人代也。……；丹青有不实之文，十世可知，百世可知，际会绝者心源自接，并我生者，其人不可轻，先我生者，其人犹可爱也……。”此比有欲与古人心灵相通意，今日读之亦“犹可爱也”。然后是二小比：“且夫诗言志，书言绪，百世上所以待白后来也；与古居，与古稽，百世下所以仰承先哲也，……”接着是中二大比：“从风流息寂以还，时而置论曰：……自来载籍流传，误于蔑古者半，误于论古者亦半，古人本不习后世之陈言，论古人者，独奈何绳以后世之苛论也，惟衡其世，以为颂读之资，……从简断编残之后，时而出论曰：我颂诗能式古训，我读书能证古文，臆见相参而莫知其覩，……从来文辞隐互，好为墨守者非，好为论正者亦非，古人本不习后世之文章，论古人者，独奈何律以后世之体制也；惟标其

世，以总诗书之纪，……。”然后是后二比：“旁行斜上，后人半紊其文，苟一经识者推求，尚可得知人微意；系月编年，史册信存其法，苟并入经生讲习，当倍深思古幽情。”最后是收结：“尚友者之论如是。”由此文可见一种历史观，这种知人论世，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去看待历史的眼光也正是我们今日所急需。

李慈铭，会稽人，乡试第 24 名，会试第 100 名，殿试二甲 86 名，以郎中用。其首题破为：“惟大贤与圣相契，不违者见其不愚也。”起二比仿孔子口气云：“一堂之晤对，教学相期，使理有未融，所贵同人之往复，何以湛然神定，……尔室之暗修，啸歌自得，诚事有未尽，不妨待质于更端，何以默尔自安，……”然后过接：“此不违如愚，吾之所疑于回者也。”接着中二比：“而回退矣，侍坐从容，岂必欠伸而视日，然天生之将倦，正当弟子之习勤……而吾省其私矣，天机洋溢，随其动静，而皆呈故燕几之优游，弥胜讲惟之严肃，……。”从上可见二比并不必字字对应，不必长短若合符节，接着是出题，与一般放在起股后不同，这是放在中股后：“吾至此始知回之亦足以发也，然则回也不愚也。”然后后二比：“海勤听藐之事，万不以拟吾侪，特以受教有浅深，则说绎亦未敢自信，……入耳出口之功，非所语于吾党，特以叩鸣有大小，则异同亦不免多岐，……”最后收结“然则吾与回言终日，益以见其不愚也，而回进矣。”房官批语是：“理境至深，文心至细。”

李慈铭第三题破为：“进论古人诗书，贵考其世焉。”然后承题：“夫古之人，较天下善士固更进矣，颂诗读书而更论其世。”随后起讲中的几句文字似还可反映出李之潜在的骄傲，日后品评世人，不屑与之伍的性格，“……此固不可泥文字以求之，又不可离文字以涤之。……以友天下善士为未足，是今之世未足论，今之人不屑知矣。……”然后起二比：“穷皇古之原而侈言荒幻，自燧巢以降，……事迹已湮而莫考……循近人之说而取法后王，自五霸既衰，……记诵多驳而不经……。”接着出题：“是则尚论古之人，舍诗书其奚取哉？然而诗书之人之世，当考而知世。”接着中二比：“诗之世分于人，豳风用夏正，而元公所作，不得止系公刘，……盖其人虽较书为多，而取材终隘也；书之人统于世，云乌岂无纪载，而立言非雅，乃托始于唐尧，……盖其世虽视诗为广，而断代亦严也。”接着后二比：“大抵简策之留遗，是非各半，自古难言之隐，有因直笔而明者，亦或因微辞而转晦；此非如今之人，能委曲以相喻也；……大抵性情之所近，取舍难齐，起居稽古之余，有因同我而褒者，亦有因异我而加贬，此非如今之人，能争执于一堂也；……岂章句之所能赅哉？”此指出了理解历史、理解古人之困难。最后收结：“此尚论之学，即尚友之学也。”其文亦显示出一些作者的新颖见解。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我们在前面指出了八股在历史上产生形成的自然而然性，构成八股的各种要素在文学上运用的悠久性，以及八股将这些作文要素有机

地结为一体的综合性，现在也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八股取士主要要求士人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此我们可以借用启功的一个通俗比喻，他说：八股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谜有谜面、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原文题目即是谜底。进一步讲，全篇的八股文几百字都是谜面。⁷² 我们一般都是就谜面（如几句话，一首诗）来猜谜底，并且常常可在规定的范围猜（如打一物、打一字），而应当说，设计一个谜面要远比猜一个谜底困难得多，设计一个几百字的长谜、韵谜、诗谜就更难了，而八股文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长谜，一个文谜（就其中比的部分而言还可以说是韵谜），八股文的作者也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长文谜的设计者。他还要通盘考虑到理、法、辞、气，乃至音调，平仄等各个方面，因而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一个学作八股者确实很难一下就掌握此技，他往往先需从二句破题学起，这是最初级、也最优先的设计谜面，然后承题扩展到三四句，起讲再扩展到十来句，再进入洋洋洒洒、音调铿锵、最见文采、也最难把握的比的部分，最后收结。在全篇文章中，都要牢牢扣紧谜底——不逾越文题所定的范围，不侵上犯下，且要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波涛起伏一般推进，最后又要收得拢，截得住。

然而，八股文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技巧，又可以说是古代乃至今天我们做文章都需要知道并应当遵循的一些要求，例如全篇文章要扣紧主题，开门见山，首尾呼应，结构严谨，有理有据，文字流畅，以及

不要堆砌华丽词藻等等。从这方面说，学八股又不是很难的，其基本要求和技巧与我们学写其他文章一样，可以触类旁通。八股文的特殊点也许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严格性：它把主要的文章技巧，乃至把骈散、文理、人我等因素巧妙地结为一体，并形成某种不能有大的逾越的定式，但这也只是用于考场，并不是说要求古人无论作什么文章都得如此。

当然，我们把八股比喻为设计谜面，只是就其形式技巧而言。总之，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所需具备的能力可约略归为以下几条：73

1.记忆能力。他必须熟记四书五经这些主要经典，不仅熟记内容大意，而且逐字逐句熟记，不仅熟记正文，而且熟记朱注，这样，对任何出题（尤其小题）他才能一眼即知其出处，知其章节，知其上文，知其下文，知其注解，知其历史背景，这样作文才能有一个基本依据，这是一种最初步的能力。它意味着必须在上下文中（context）把握全体。

2.理解义理的能力。他必须充分和确切地理解经书及经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字句之间有何逻辑上的关联，然后才有可能引申发挥，代圣贤立言。

3.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的能力。如果说记忆和理解能力主要是一种投入，一种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本的能力，那么要写好八股就

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即一种产出的能力，一种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用雅驯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涉及到一种文学的领悟力和想象力。

以上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及语言美。⁷⁴ 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这几种能力固然不能离开后天训练，但更和天资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人会有一个人是不是“读书种子”之说。费孝通，潘光旦也认为，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⁷⁵

1933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请陈寅恪代拟大学入学国文试题，陈寅恪且有以类似于八股中的基本要素（比和代）出题的尝试，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时，陈寅恪定一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又一对子题为“孙行者”。“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对子题“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梦游”可说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代”，而对对子亦即为“比”，均为八股之基本要素，而比起旧日八股来，自然还是容易多了，陈寅恪拟之以低就当日考大学者，然当时舆论却也哗然。陈寅恪后来在与刘叔雅书中对出对子题的旨趣做了解释：“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

度，始能於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於对对子之一方法。”陈寅恪并批评了《马氏文通》将印欧语系中之特殊规则视为金科玉律，一概施诸汉文的“不通”，指出任何比较必具一历史观念，否则将怪诞百出。而对偶确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表现其特殊优点，具体说有四条：1.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2.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而能分平仄，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传统文学。3.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籍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⁷⁶ 总之，八股有别于古代的帖经墨义，也有别于当代也仍然屡见不鲜的那种需要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⁷⁷ 而主要是一种智力、能力的检定。⁷⁸

为什么不考别的？为什么考试内容不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时政？比方说就考时务策论，或以之为主，或至少允许考生在经义中评论时政，以求考试较切于政治，较切于实用呢？然而，此法并不是在历代的考试中没有屡次试过，也曾留下过几则佳话，然而若普遍推行，以之作为一种制度，它的弊害也是迅速而明显的。这样考也许有可能使少数有责任感和见识的士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与才学，但是这一全国规模、机会平等的公开考试，并不能只对这少数人开放（也

无法先行鉴别他们)，而它本身客观上又是一种与名利相联系的上升之途，大多数考生并未经过政治习练，甚至有些尚乏生活阅历，故不易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因此，即便策论题为实事，大多数人大概也只能是空发议论，乃至助长妄言之风，且此常常会导致或加剧政治上的派别之争，而一些考生还可能为求取中而揣摩迎合考官的政见，乃至于在其中暗藏关节，与考官一起营私舞弊。而且，议论时事亦非一般义理那样可使考生深入发挥，也不便于考官悬一客观准绳进行衡量。总之，科场并不是合适的干政、议政之处，它不过是选择日后也许可堪造就的政治人材而已。79

注 释

- 1 陶福履：《常谈》，《丛书集成》初编本 0897，页 16。又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书义矜式》提要”。
- 2 如焦循认为，八股之入口气代人论说，是源于金、元之曲剧。破题则唐律、试赋起处也叫“破题”。比更可溯至南朝骈文乃至先秦诸子。
- 3 如朱筠认为制义是原于唐五经正义，见《笥河文集》“安徽试卷序”。又如金克木在“八股新论”举《论语·季氏》首章“季氏将伐颛臾”为原始八股结构之例，见《说八股》，中华书局 1994 年版，页 129～137。
- 4 其次我还怀疑是否有可能明确系年，理由如后。

5 由于八股文的综合性，从其某个成分、某个特点或某些方面的形式结构着眼，都有可能溯至久远。

6 本文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八股文的。

7 以上虚线表示容有较大变动者，如“入题”有时隐入起讲，“出题”不一定都在起股后，束股的二小比时而略去，或放在其他股之间，但这样冒、比、结三部分的结构以及中间主体部分必须由比偶组成则一定不易。

8 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

9 《四库全书总目》“《论学绳尺》提要”。

10 南宋朱熹，明末清初顾亭林等均有过最好停几科科举之说，以扭转某种积重难返之势，此当另论。

11 《日知录》，“试文格式”，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739~740。

12 四书义明代规定 300 字，清初 550 字，康熙 20 年增 100 字，乾隆 43 年定 700 字，自是不变。

13 这大致是以代入语气、体用排偶即谓之“八股”，此其一。其二，如果对《明史·选举志》标点如上文，则也可把《明史·选举志》朱、

刘“所定”理解为只是指定“科目”及“以四书五经命题”，而下句“其文”则是流变而成。

14 《明会典》卷 77，《科举·科举通例》。

15 题出《论语·季氏》。

16 收在《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二。

17 题出《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至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天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18 明祖之专制可从另外的方面见而不必由此。洪武中曾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康熙据说也是因厌薄八股才废过两科八股，较有实际治国才能的君主可能都不会太喜欢八股一类容易流于浮华的文字。

19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45。

20 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21 中仅一程文，余均为墨卷。

22 区分不易，点评更难，故主要征引前人评论，盼识者指正。

23 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世人所谓才者，倾倚偏驳，奔放纵横，其气外轶，其理为绌。虽足以惊世骇俗，然卒不能久，鹤滩之文，发明议理，敷物治道，正大醇确，典则深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文章衣被天下，为制义极则。”

24 收在《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二。

25 题出《论语·里仁》：“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26 收在《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六。

27 题出《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28 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出者。前此风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制守溪而备。”

29 收在《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六。

30 同上。

31 收在《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三。

32 题出《论语·颜渊》：“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33 见《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三。

34 《明史·文苑传》：“有光制举，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与德清胡友信齐名，世并称‘归胡’”，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又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震川“贯通精术，穷极理奥，而连以《史》《汉》八大家之气，其古文已成家，更深于制义，力挽颓风，跻之古人，使天下复见宋人之旧，厥功茂焉。”

35 收在《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六。

36 题出《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37 如不按句读而按现代标点符号，则只是一句。

38 张行简：《塾课发蒙·文式五则》。

39 具体代法可参见前引张行简书。

40 二例均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 23。

41 《艺概》“经义概”。

42 《红楼梦》中贾宝玉开笔后不久先学破题，第 84 回中有贾政问他破题及修改的一大段讨论，见该书长沙岳麓书社 1987 版，页 685-686。

43 《艺概》“经义概”。

44 见《清代硃卷集成》册 28-32，依会试名次排列，括弧内为籍贯和会试名次。当年与会试者尚有洪钧（吴县 225、殿试状元），陶模（秀水 130）、张人骏（丰润 237）等名人，惜缺文章。

45 题出自《论语·季氏》第 8 章：“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46 明破如以“孝弟”破“孝弟”，“道德”破“道德”，暗破则以“伦”代“孝弟”，以“理”代“道德”。

47 如“学而时习之”，先破“学”后破“时习”是顺破，反之是逆破。

48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岳麓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111。

49 《清代硃卷集成》册 32-35，题出自《论语·学而》。

50 虽然所破可能已属“边锋”，名次较靠后，为第 267 名。

51 董其昌《论文九诀》，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经义部”。

52 还有一种揣摩则是指揣摩风气，揣摩考官，兹不论。

53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页 91，长沙：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又见《儒林外史》中的高翰林批评补廪二十四年，考过六、七个案首却不能中举，多年选文的马纯上（马二先生）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不中的。”马纯上全然不知此中的奥妙，“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由此亦可见小试与大场的一个区别。见《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333。

54 《谈艺录》页 33，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又见页 361 补订二。

55 参《管锥篇》，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页 165-166。

56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七，又袁枚《小仓山房尺牋》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亦说八股通曲。

57 贺子翼《激书》卷二“涤习”：“黄君辅学举子业，游汤义仍先生之门。每进所业，先生辄掷之地，曰‘汝能焚所为文，看吾填词乎。’乃授以牡丹记。闭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由此文思泉涌。”又张诗《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谓生平举业得力于《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

而其弊则流于“以俳优之道，挟圣贤之心”。参钱钟书《谈艺录》页32，360-361，中华书局1984年版。

58 《钦定四书文》“序”。

59 “一道德”在传统社会中似不仅可行，还不能不如此行，于是，历史的问题就不在要不要“一”，不可“代”，而在其所欲“代”之义理，所欲“一”之道德是否合适了。

60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233。

61 不仅小考，乡会试中也是如此。

62 两扇题、三扇题，虽然看起来比少，但大比中又有小比，实际上还是不少。

63 《安乐康平室随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60。

64 《书香堂笔记》。金克木认为《论语·季氏》即有破有比，相当整齐。

65 《艺概》“经义概”。清代所建的昆明面对滇池的大观楼，上面长联的作者大概也是八股高手，而明、清科场广泛流传的讽刺考官、乃至讥刺八股的丰富的幽默文学看来也受了八股训练之赐。

66 《艺概》“经义概”。

67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页 118-119，长沙：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68 《清代硃卷集成》册 32。

69 见光绪廿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文“八股辩”。

70 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 1989 年版，页 112-118。

71 收在《清代硃卷集成》册 46。

72 见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页 12。

73 我们在此只谈能力，不谈知识积累和学养。

74 当然这三种能力不是完全分隔的，也有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一面。另外，据周作人说：“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有一个族叔，文理精通，而屡试不售，遂发奋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鹄》？），半年后应府县考皆列前茅，次年春天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声调重，做文的秘诀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见周作人《中

国新文学的源流》，载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77—78。

75 参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载：《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清华大学出版（1947. 11）。

76 以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页 227-228。当然，陈寅恪并不是有意联系八股，而是从中国语文的特性考虑的，但这也恰好显示了八股与中国语文特性的联系。当时之哗然足已见当日学生之水平，今天自然就更不可论了。今天语文中考、高考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语文知识测验，其中许多内容仍是以西方色彩浓厚的语法和繁琐的词义（且须紧扣教科书）考学生，再好的作家、学者不专门准备大概也是考不好的，而能通过记诵考好者也很难说就能写出好文章；另一部分是作文，则命题范围大致是记某个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某件我印象最深的事之类，常可予拟，在考场上抄袭旧文。无怪乎语文成绩远不如数学成绩那样受人重视。

77 八股有标准，却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78 其实际效果正如邓云乡回忆说：“我是二十年代未开始上学识字、读书的，当时在山乡，中年秀才作小学教师的还不少。常听人们说起：‘没有不通的秀才’。这个‘通不通’，是指思路的通不通，也就是说逻辑思维的通不通。至於其它知识，一般说旧学是十分扎实的，而

且都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其它诗韵四声的韵部及各韵中的字、《康熙字典》甚至《说文》的部首，以及先秦《左传》中的史事、《纲鉴》中的历朝史事，都清清楚楚，记忆中十分熟悉，脱口而出。有的还用老办法学会了数学、英文等，我曾经见过一位英文甚好，能随意读英文书、看英文报的老先生，但不会说。外国人看他拿着英文在读，同他打招呼，他都茫然不知所对，外国人感到很奇怪。而他学会英文是用《英汉字典》死记的。这种老学究的记忆力和耐力韧性可以想见了。自然这些还是末代的、未考取举人、进士的秀才。如果是《眉园日课》时秀才，其学识功力（自然是中国旧学）恐怕就更要高多了。”见其“《眉园日课》书后”，载《中国文化》第13期，北京1996。这些秀才也能掌握作为新学的英文、数学，说明他们确有相当的智力，还不止是邓氏所说的记忆力。

79 包括使道德文章优异者居于社会高位，这本身也就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即所谓“使贤者居其上，不贤者居其下，则民服。”